

漫话读书笔记写作

曾祥铎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爱我中华一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

袁昌文 刘绍本 傅德岷 主 编

漫话读书笔记写作

曾祥铤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我中华—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袁昌文 刘绍本 傅德珉 主编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3

ISBN 7-81036-085-X/G.30

I. 爱… II. 袁…刘…傅… III. 写作—教学 IV. G.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16 号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印刷:花都区新华印刷厂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

邮编:510800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500 千字

版次:2001 年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全套定价:148 元(每册均价: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爱我中华——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

编委会

组 稿 河北省写作学会
贵州省写作学会
重庆市写作学会

主 编 袁昌文 刘绍本 傅德岷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牛炳文 周进祥 杨红莉
曾祥铤 刘绍本 张玉田
傅德岷 黄俊杰 王黔辉
袁昌文 郑江义

作者简介

曾祥铤，笔名播声，1937 年生于贵州遵义。生于牛年，其壮如年，其犟如牛，其命如牛，唯其笨还不如牛。读了十年师范，教了十年书，主要执教于座落茅台的仁怀二中及遵义城西北部的遵义教育学院。遵义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顾问，贵州省写作学会、贵州省写作学会、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遵义民间文艺协会会员。大量时间耗于繁杂事务，先后仅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写作论文、文学评论、散文各数十篇，与王刚同志合作出版《那片诱人的土地——黔北文学论集》、《黔北 20 世纪文学史》二书，参与过一些书籍的编写。

《爱我中华一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总序

这部《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是由贵州省写作学会、重庆市写作学会和河北省写作学会共同策划组织与编著完成的。书系共辑有十本新著，每本著作的内容或集中于文学评论、艺术札记；或集中于写作随笔、文学与写作专论等。新世纪之初，开辟并推出此列“书系”，不仅旨在回顾和盘点前一时期文艺评论写作的成果，而且关注并疾声呼唤写作学科的理论创新与俱时跨越。

这部《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所辑的文艺评论著作，实际在报告着处于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文学艺术批评的蜕变与整合。这些年来，文学评论的写作在高等院校的写作课堂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这种体裁的写作范围非常广泛，评论对象包括作家作品、文艺主张、文艺运动、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等等，其中是以对文艺作品的分析评价为基本内容的。同时，文艺评论可以总结创作经验，也可以剖析艺术特色，还可以指出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评估作家或作品的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引导读者如何阅读和接受等，它是建设文艺理论、总结创作经验、推动艺术实践、提高鉴赏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文艺评论的发展状况引起普遍关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文艺批评的开展，总是要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凭借某种哲学、美学、文艺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某种具体文艺现象和某位活跃的艺术家的审美判断；与此同时，每位称职的评论家又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又都享有独立思考的权力。回顾二十世纪的末期，有个阶段被称做是文艺评论“众语喧哗”的时刻：短短的十几年间，我国批评界把西方二十世纪流行的几乎所有批评方法，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语义学、解构主义等等，都重新操演了

一遍,一时形成了众多的评论声音共同呐喊的喧哗场景。然而,在这一片喧哗声中,人们很快发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美学的文艺批评思想并没有真正“失语”。相反,市场经济越是发达、越是需要科学思想及其文艺批评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对现实生活和文艺现象加以梳理解剖,以重新唤醒人们对于人和人性,对于道德和社会结构臻于完美的理想化追求。这里,不妨试举“后现代批评”来阐释一下:产生于西方学院之中的“后现代”有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就是“反本质主义”,认为作品本身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意义,也根本不存在这种“作品意义”和“作家本意”的客观对应关系;认为一件作品一经面世,它的作者就丧失了对它的解释权,实际已经“死亡”,意义的决定权完全在于受众,起码是在某些受众手中。从“后现代”的观点看,对同一件作品的看法截然相反,阐释出的意义完全不同,实属非常正常。就看谁能想方设法说理翻新,“争取民心”,取得“话语霸权”。“后现代”把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对作品可以任意阐释,没有任何边界,不受任何限制。这样一来,对作品的评论实际成为批评者的智力展示和学术游戏,读了往往令人耳目震聩甚至只有瞠目结舌。

这部《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所辑的文艺评论著作,通过几位青年写作学者的辛勤实践成果,还有一些检阅和倡导文艺批评学理化的含意,反对流行一时的酷评和浮词批评的行业弊端。特别是酷评现象,似乎曾经成为一种文化时尚,诱惑不少批评家趋时效仿,洞穿其实质乃是蛮横而粗鄙的精神暴力,是作者内心虚弱和丧失自信力后强加的伪饰。作为精神暴力,酷评造成了学术的严重失范;作为强加的伪饰,酷评造成了批评堕落失色。酷评家惯用的手法,无外乎恶语相向、人身攻击、大言不惭和无聊改证之类,尽失学理风范。为了维护文艺评论学术的尊严,必须对心理变态而常于施谗的酷评家施予劝诫和笔伐,勿使酷评风潮泛滥。至于浮词批评呢,实属“轻薄为文”,表现为无的放矢、套话连篇,或是巧言令

色、故弄玄虚。它对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无益而有害,成了被人用做应景和骗取名利的工具。这些酷评家和浮词批评家不但败坏了文艺批评,更严重的后果是干扰和妨碍了文艺创作的正常发展。我们否定和拒绝酷评、浮词批评,倡导实是求是和科学说理的评论实践,目的恰在保证文艺批评的学理化和健康发展。

这部《世界文评与写作书系》所辑的写作理论和体裁专论等著作,又试图在回顾和总结过去世界写作学理建设的基础上,为这门学科新体系的创建做些学术探求与开拓性工作。

应该说,中国传统写作理论是有其体系的,历代著作家和学者们不少人都力图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写作学体系。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陈骙的《文则》、明代朱荃宰的《文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都从不同角度为体系的建立做出过贡献。至于现当代人在这方面的建树更不必评述。历史发展到新的世纪,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加以整理和研究,使得整个写作学的理论体系更科学、更系统,更能体现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写作理论的风貌。这样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起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理总论,研究写作学中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文道论、文德论、文气论、文质论、言意论、风格论、流派论等是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写作本质的看法。二是写作规律论,对各种写作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古今写作实践经验,内容十分丰富,如怎样立意、传情、用事、谋篇,怎样用字措词,以及丰富多采的表现方法、技法的运用等。三是文体论,文章体裁专论研究源远流长,古代著名论著如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南朝任昉的《文章缘起》、明朝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但前人文体观念尚觉偏狭,应在新的社会生活需要和写作实践中,加强扩展探求。四是风格流派论与品评论,建立完善的写作体系,自然应给这部分内容以

应有的地位。当然,建立面向新世纪的写作学科新体系,决非一时一地之功,须要写作学界同心协力切实奋斗,方见初效。“书系”所辑的几本论著,就是这方面努力显示的初步成果,愿引来硕果满枝的学术丰收景象。

这部《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对辑入其中的文艺评论和写作理论各本著作,十分强调其创造性的品格,“惟陈词之务去”,以新论为参予书系的入门条件。文学艺术评论和写作理论研究均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它对具体文本的读解不可能只停留在鉴赏的层面上。任何文本所提供給受众的信息都是庞杂繁多的,它对生活的反映和审美表现是全方位的,带有极强的作家个性创造色彩。而评论家与研究学者无疑是用某种理论对作家作品的反映和表现,进行审美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或总结,进而实现对人生对生活的审视与谛听。但是这种审视与谛听必然渗透着论家与学者的独特思考与创新成分。也就是说,文艺评论与写作研究带有创造性的特点,它是人的“一种创造力”在文化领域里是对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运用和体现。这样,就要求评论与研究的主体具有灵敏的透视力和较强的概括力,更要有丰富的生活实践积累和深厚的学养素质。强健的主体,再经过艰苦的精神劳动,对具体的文体进行认识、判断,在其过程中,须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惟其如此才能发挥文艺评论和写作研究这些特殊的审美认识活动的职能和作用,对著作家有所帮助与启发,对读者和受众有所警示与引导,对学术理论有所丰富与建树。

这部《世纪文评与写作书系》所辑著作的作者,大多工作在写作教学与文艺评论岗位第一线,具有一定的评论与研究实践积累。完成各自的书稿后,有的在入编“书系”前又加以修改删削。现呈献诸位专家读者面前,心存惶恐,恳请批评指正!

袁昌文 傅德岷 刘绍本
于新世纪开元之年

目 录

读书笔记的广泛运用

- 一、看似细微,却与伟人缘不薄 (1)
- 二、不嫌细碎,集腋终归可成裘 (8)
- 三、善于捕捉,融零集散成大器 (15)
- 四、养性储材,为动笔墨好读书 (21)

读书笔记的作用

- 五、加深理解,帮助吸收 (29)
- 六、加强记忆,补偿记忆 (36)
- 七、积累资料,增知孕果 (43)
- 八、锻炼思维,促进写作 (50)
- 九、保存遗佚,蕴含新异 (57)
- 十、激发兴趣,陶冶品格 (64)

读书笔记的种类

- 十一、符号:简便、醒目、多样 (71)
- 十二、批注:解析、品评、发挥 (78)
- 十三、抄录:抄下你所需要的 (85)
- 十四、摘要:摘出原文要点来 (92)
- 十五、提要:概述与题解 (99)
- 十六、提纲:条列与表解 (106)
- 十七、索引:并非仅为备查 (114)
- 十八、质疑:且作寻探 因由 (121)

十九、批驳:不同见解的提出与阐述	(128)
二十、补充:围绕中心的引申与发挥	(135)
二一、札记:步入研究和创造的阶梯	(142)
二二、心得:写出点滴或系统的见解	(149)
二三、综述:综括现状,展述趋势	(156)
二四、专题:问题明确,内容专一	(163)

读书笔记的载体

二五、不易散失的笔记本	(170)
二六、灵活简便的卡片	(177)
二七、幅大易调的活页	(184)
二八、不需另备的原件	(191)
二九、省时省力的剪报	(198)
三十、不拘一格的物件	(205)
后 记	(212)

读书笔记的广泛运用

一、看似细微，却与伟人缘不薄 ——革命家与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看似微不足道，而思想博大精深的革命家们，在吸取与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历程中，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7年，青年毛泽东有一次去拜望老师杨昌济，杨老师的女儿杨开慧接过他手中的一本书，见书的天头地脚满是批注，字里行间也划着各种记号，她惊喜道：“难怪我爸总是夸奖你，你真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呀！”对特别喜欢的书，毛泽东不仅一读再读，而且每读一次就要作一次笔记。在成就毛泽东与杨开慧美满姻缘的过程中，显现毛泽东勤奋好学精神的读书笔记，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么？

一生广阅博览的毛泽东，作读书笔记，绝非偶然为之，从青少年时代直至仍能挥笔动毫的最后岁月，读书笔记一直与之相伴。

求学时代，既在读过的书上圈点、批注，也用笔记抄录原文、选摘精要。书本上，朱墨纷呈，圈点满页；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四、五年中就有几网篮之多。1914年写下的笔记本《讲堂录》中，抄录了潘耒为《日知录》所写的序言；写下了阅读朱熹《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四书集注》等著作后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评价；抄写

了《离骚》、《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抄文上面还写了各节的提要……。1917年，读了德国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一万二千多字的笔记，而原文也不过约十万字。

革命战争年代，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圈点、批注，突出重点，突出关键，并用以帮助其他同志提高与加深认识。长征期间与毛泽东一起行过军的刘英回忆说，他读书的时候，读得十分专心，不停地在书上划杠杠。延安时期，对从中央苏区带来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虽因长征途中的反复阅读而变得有些破旧，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的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① 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一本《国家与革命》，“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旁边都划着杠杠，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出处同前）1948年4月21日，在《“左派”幼稚病》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阅读并作了符号、批注笔记的书籍，远远不止这几本，但由此已经可看出他读书时写作笔记的一些情况。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再次阅读了《资本论》，多次攻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列宁的多数政治经济学论文，作了许多圈点、批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逢先知说：“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以按语的形式，写下了104篇他阅读后的感想与评价。

由于生活较解放战争时期安定及指导全国各方面工作的需

^① 逢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要,本来就广阅博览的毛泽东阅读的范围更加广泛,政治、军事、哲学、逻辑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等,无一不在他的扫视范围之内,且凡属他阅读过的书籍,极少有不留下他的笔迹的。张贻玖在《毛泽东读中国古典诗词》中,列出了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中国古典诗词的数据:“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诗人429位。”毛泽东常常要读好几种不同的版本,而每读都要批划,“仅仅他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就有6部,《唐诗三百首》5部,《古诗源》5部,《词综》4部。”徐中远《毛泽东读鲁迅著作》中说:“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同读其他著作一样,常常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一边读,一边划,文章读完了,书上也划满了直线、曲线、圈圈、点点、三角、句号等等多种符号和标志;同时还留下一些简明的批语。”“凡是原书中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

阅读并圈划、批注,一直持续到毛泽东的晚年。“直到逝世之前重病缠身,他还用颤抖的手在许多册的封面上记下:‘1975,8再阅’,‘1975,9再阅’”^①。

马克思极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中,读书笔记的写作是不容忽视的。他阅读范围之广,笔记量之大,也都是十分惊人的。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的中译者之一梅绍武,在该书的《译序》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了许多人已经熟知的情况:

……马克思一生好学不倦,学识极其渊博,读书之多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涉猎之广也是罕见的。他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读了一千五百多种有关经济学、文化史、技术史等许多领域的科学著作,还作了大量的摘要。《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之后,马克思因患病,工作

① 张贻玖《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经常中辍,却读书不懈,并作大量笔记,“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消耗和收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异。”

引号中那句话引自马·鲁贝尔和马·马那尔的《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一书,可见马克思的著述与读书笔记的密切关系,早已为学者们所关注。

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也忆及了马克思读书的情况:

……他常折叠书角,画线,用铅笔在页边空白上作满记号。他不在书里写批注,但当他发现作者有错误的时候,他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个问题或一个惊叹号。画横线的方法使他能够非常容易地在书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他有这样一种习惯,隔一些时候就要重读一次他的笔记和书中做上记号的地方,来巩固他的非常强而且精确的记忆。

马克思对读书笔记的重视,是从求学时代就开始的。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我不仅习惯于从我读过的书籍中作出摘要,例如对莱辛的《拉奥孔》、李尔格的《伊尔文》、温克尔的《艺术史》和鲁登的《法国史》等书,都是这样做的,而且还附上自己的意见。”既作摘要,又写心得,求学时代养成的这读书必动笔的习惯,终生未变。

1865年,马克思的女儿们向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等客人提出二十个问题,马克思把他的答案名之曰《自白》^①,对第十个问题“您喜爱的事”的答案是“啃书本”。这一问答带有家庭的游戏性质,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

“啃书本”这一答案却为马克思终身的行为所证实；“啃”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写读书笔记。

对马克思“消耗和收集的成吨材料”“感到惊异”的恩格斯，其大量著作也是在自己所搜集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保尔·拉法格在《忆恩格斯》中对他知识的渊博也表示十分惊奇：“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彻底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完全得到满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识的渊博，同时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惊奇；恩格斯丝毫不象一个关在书房里的学者，如何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识！”拉法格还写道：“性情激烈、生龙活虎般的恩格斯也以少女般的细微而有条理见称，他总是非常勤勉地将什么东西都抄录下来并保存起来的。”

恩格斯惯于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札记、片断，进而形成单篇论文或论著。例如，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就是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各方面资料，经过笔记、札记、论文等阶段积累而成的一本重要著作，是直到今天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所必须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①“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写了十篇初步完成的论文以及一百七十多篇札记和片断。他逝世后，这些笔记已被发表，成为自然辩证法的奠基性的经典著作。”^②。

读书笔记在列宁阅读、研究、写作过程中，在列宁革命实践活动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回忆到列宁的读书情况时说：“他不仅善于读书，而且善于钻研书。”回忆到萨马拉这个时期，她又说：“他善于学习，善于有系统地刻苦地进行学习……他按照一定的计划读书。记得在稍后的几年中他常常说，一般地阅读各种书籍，收效是不大的。”萨马拉时期指1889年5月至1893年8月这四年半时间，1887年12月因参加反对大学里的警察制度的学生抗

① 狄茨《谈谈读书方法的几个问题》。

② 张之《读书的艺术》。

议大会,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到喀山附近的农村,一年后,准许回喀山,但不准再回喀山大学读书,此时,列宁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89年5月即移居萨马拉,埋头读了四年半的书。高里科夫等的《列宁是怎样写作的》一书中,对此有一段叙述:

列宁住在萨马拉时,除了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著作。正如阿多拉茨基所指出的,列宁深刻地研究了《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这样一些著作。列宁不是一般地阅读这些著作,而是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攻读”。他在书中作了批注,记下了要点,把一些最重要的地方摘记在笔记本里。据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列宁在萨马拉积存了大量这样的笔记本子。

作批注、记要点、摘记最重要的地方,这就不是“一般地阅读”,而是在“研究”,在“攻读”,这就是“善于钻研书”的具体表现。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到列宁写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时,说他“在准备演说和平时看书时总是喜欢画各种重线、写读书批注、作摘录和摘要,并经常地、大量地使用它们。它们总是语言简练而表意明白。”据统计,在《列宁全集》中,列宁引用自己看过的书有一万六千多册,其中俄语书一万二千多册。

批注是列宁最常用的笔记形式。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上作批注,在党内各种出版物上作批注,在各国出版的一些书籍和定期刊物上也作批注,带有列宁批注的出版物,已经成了列宁写作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收藏和储存的有列宁批注的书籍、杂志、报纸及其它出版物,就有八百多种。列宁有一句常用的口头语:“应当向马克